



“从外表看，她满身都是刺，是真真正正的坚不可摧的堡垒，但直觉告诉我，从内在看，她不折不扣地和刺猬一样的细腻。刺猬是一种伪装成懒洋洋样子的动物，喜欢封闭自己在无人之境，却有着非凡的优雅。”

法国电影《刺猬的优雅》里，12岁的富家小姐芭洛玛这样评价她的门房荷妮。

芭洛玛住在一套高档住宅里，家境富裕。在大人眼中是一个古怪、孤僻、不合群、不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的孩子。她则认为自己是一条永远也突破了重围，令人摆布的金鱼，她觉得自己人生的终点便是金鱼缸。她想象各种的死亡方式，决定要在12岁生日前拍一部电影。

直到她遇到了荷妮。54岁的荷妮，身材肥胖，发型万年不变。在高档住宅楼里做门房，每天打扫垃圾，收发邮件。她彬彬有礼却又冷漠绝情。她将自己隐藏在看门人的角色里日子日复一日，死气沉沉。然而她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一屋子品位高雅的书籍和唱片，她喜欢读书时喝茶、抿巧克力，优雅至极，在她局促、拘谨、卑微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丰富、深邃、优雅的心灵。

她像一只刺猬，将自己的优雅、兴趣小心翼翼地藏好，在无人纷扰的世界里，享受自己内心独处的

一片宁静。她与芭洛玛一样，都是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者，她们把自己蜷缩在硬刺的包围里，冷眼打量着这个世界。

直到有一天小津先生出现。小津先生的与众不同在于他对门房、仆人与上流社会的政要与精英一样温和、礼貌。他文质彬彬，举止优雅。他温和有礼，像一束温暖的微光。

入住的第一天，小津就细腻地发现了荷妮的与众不同。在与芭洛玛简短友好的对话中，他们彼此也

刺猬的优雅

张梅

在心间亮起了相互辉映的星光，建筑了相通相惜的桥梁。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短短两句仿佛密码开启了小津先生与荷妮两个毫不相干地人的系统兼容模式。他打听她的猫的名字，猜她喜欢《安娜·卡列妮娜》，于是送她这本书；他邀请她去家里吃晚饭，饭后一起看录像带。荷妮一眼认出墙上挂的图片正是小津安二郎作品《宗方姐妹》中的“红豆雪山”，两颗心互相叩击的瞬间眼神交错，电火雷鸣。

小津钟情于有着刺猬外表、优雅内心的荷妮，他带荷妮去自己最喜欢的餐馆庆祝生日。得到邀请后，

荷妮的内心激动而不安，虽然她内心无比渴望这种幸福的滋养，但是她的卑微与自卑始终捆绑着她，她渐行渐远，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爱情，她如同刺猬一般，把柔软的心藏在厚厚的刺壳里。她的拒绝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

为打消她的自卑，小津为她送来了礼服、披肩、高跟鞋，并附上纸条，“请接受几件简朴的衣服”。荷妮脸上露出了少女般的笑容，闪烁出夺目的光彩，以至于她与小津先生一同散步遇到邻居太太，对方居然没有认出她来。

晚餐吃得很愉快，两颗孤独而温热的心前所未有地靠近，前所未有的满足。大提琴悠扬而沉静，故事却戛然而止，荷妮在车祸中去世。她如此安详、平静地离去，如此优雅地谢幕，因为她早已对生死安之若素、超脱如常。她曾经对芭洛玛说，“重要的不是什么时候死，而是死亡那一刻我们正在做什么。”

人人如刺猬，优雅者寡。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偌大的世界中，我们会因为这份珍贵的懂得而不再孤独。

想起村上春树说过：孤独一人也没关系，只要能发自内心地爱着一个人，人生就会有救，哪怕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

灯火阑珊处，自有耐寒人。

在同龄人中，我敬佩之人，除樊锦诗外，还有一位是杨德广。他和我相识在1965年，两人当时是上海最年轻的大学团委书记，他刚从华师大毕业。我们的友谊保持了54年之久。

杨德广当上师大校长时，被称作“自行车校长”，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2003年从校长岗位退下来后，自2004年开始，新年第一天上班，就捐款给学校爱心基金会和教育发展基金会2004元；如此，每年递增1元，连续捐了15年，还要一直捐下去。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不是拥有万贯家财的富豪，却在十多年前变卖了自己名下的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加上稿费、讲课费的积蓄，还向女儿借了23万元，凑足300万元，分赠小学、中学、大学三所母校，设立贫困生奖学金。此举轰动上海，他又被誉为“慈善校长”。他两次被评为上海市慈善之星，去年又获得第十届中华慈善楷模的称号。

华师大有位80多岁的孙教授，碰到杨德广说：“你卖房助学的事迹我看到了，你做得对，你做得好，你活明白了。”三句话的评价，杨德广听了深以为然。

杨德广真是“活明白了”。而“活明白了”的基础，来自“想明白了”：钱从何处来，应向何处去？

有人曾问杨德广：你为什么把房子和钱留给子女？他回答说：“我完全可以留给子女，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这笔钱给我子女的话，他们无非是日子过得再好一点，多吃几块红烧肉，多到外面旅游几次，那是锦上添花。但是，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过得去。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雪中送炭要比锦上添花更好。”

这是他的肺腑之言。2013年，杨德广第一次到中国西部地区学校考察，看到有些坐在黄土墩上吃午饭的孩子，从书包里拿出几个窝窝头啃，什么菜都没有，井水也没有，只舀一点积在缸里的雨水，就着吃窝窝头。杨德广眼睛湿润了。他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他生活在江苏农村，父母都是文盲，每年三、四月，家中断粮，靠挖野菜果腹。一个妹妹在襁褓中就送了人。求学更是十分艰苦，享受国家全额助学金，中学六年，还靠在上海当学徒的哥哥接济，每月总共只有10元钱生活费。20岁，他背一个装着书和旧衣服

麻袋，带上家中仅有的三元钱，到华师大报到。

杨德广万万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生活贫苦的学生，没有想到他们的午餐是这样的简陋。他想明白了，一定要把自己多余的钱包出去，用到这些孩子身上，自己才能心安一些。他这样做后，收到了很多受助学生来信，说他们把钱用在给父母看病，或自己买学习用品，很开心。杨德广也开心，他的儿女也开心。杨德广的女儿学习老爸，每年元旦也捐一笔善款，自己过生日必捐出两万元；现在连外孙女过生日，也抢着去捐钱献爱心，从小觉得这样过生日特别有意义。杨德广对困难学生一直倾囊相助，而自己的生活却俭朴到近乎苛刻。

杨德广“活明白了”，包括想明白人为什么要活在世界上。他说：“无为何人入世，入世有所为”。这是他的人生观。现在老了，从岗位上退下来了，不如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奉献社会。他每个月都拿出一半的收入，用于资助贫困生，帮助他们圆大学梦。现在他资助的学生中已有36名考进大学，安徽的江冬冬、江录春兄弟俩，一个考入同济大学读博，一个在交大硕博连读。这也是一种“入世有所为”。杨德广想到此，信心倍增，很有成就感。十年来，他组织的阳光慈善团队，共资助了8000多名贫困生和优秀生。

杨德广做慈善，还有一点意外收获：就是慈善是对健康的最好投资。做慈善，为他带来一种他人很难领略、富有乐趣的生活方式。因为多做好事，心情舒畅，身体也格外健康。虽然年近八十，却依然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走得动，写得快，睡得着。每个节假日，对杨德广来说，几乎都是“劳动节”，也是他提升生命价值的最佳时期。一些重要科研课题、长篇文章、书稿，都是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因为他挚爱的、志同道合的妻子郭老师不幸早逝，他更不敢一日闲过。退休16年来，他指导和培养了20多位研究生，出版了8本著作，撰写和发表了200余篇文章，做了1000多次讲座。人生如斯，生命在快乐中得到延长，生命在奉献中更有价值。

杨德广，一个真正“活明白”的人！



戴平

冬日，等雪落

玉玲珑

立冬这天，我把微信的头像换了，换成了一幅冬日图，寒风中，一段枯树干上飘落着最后的两片黄叶，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朔风起，万物藏。之前的微信还停留在夏季，是月下的荷塘，翠绿的荷叶还有藕花深处的一只独舟。秋天过得有些忙碌，等闲暇下来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桂花已经落了，菊花黄了，海棠树上挂上了鲜艳的果子，还来得及找一幅合适的秋色图，今年秋天就这么过去了。没有郑重地开启秋天的模式，就仿佛没有认真地过似的，关于今年秋天的印记，是模糊的，匆忙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喜欢在季节转换之际换上一张与之相应的头像，有时候春天是新开的一枝桃花，夏天是清圆的荷叶，秋天是飘零的落叶，冬天是雪下的梅枝。春天有春天的心事，秋天有秋天的思绪，换一张头像就仿佛重新收拾出另一番心情，投入到另一种生活状态，这样一来，生活就有了一种仪式感，再平凡简单的日子也会有所附丽，让人期待。

四时有大美，值得用心体会。说起来，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季跟冬季，大概是这两个季节最有趣，最接近童真。一个繁华到极致，一个就是繁华落尽后的返璞归真。夏天在浓荫的树下抓知了，到水塘边采荷花，捉泥鳅，夏天的夜里躺在瓜棚里看瓜，瓜棚的上方，是一轮明亮的月光，照得四周亮堂堂的，有清亮的蝉声传来。冬天北风呼啸，早晨起来，窗户纸上透着亮光，以为是太阳升起来了，趴窗户往外看，却是一夜的大雪映得窗户纸都白了。旁边炉子上妈妈烤的喧喧腾腾的棉袄棉裤，穿上衣服就往外跑，打雪仗，堆雪人，手冻得小萝卜头似的也不肯回屋。

似乎冬天的趣事总是跟雪有关，只需一场雪，你就能明白冬天的好处，网上有个段子，一下了雪，北京就成了紫禁城，南京就成了金陵，西安就成了长安，开封就成了汴京。再普通的景致，都会因为一场雪，变成天上的琼楼玉宇。雪一落，腊梅花就开了，雪下折梅，雪地上还有竹叶形的爪印，是鸟雀的，一对对，就像画在雪地上的画。更多的是人的脚印，深深浅浅，通向远方，似飞鸿踏雪泥，带给人们启示。

冬天到了，不妨温上一壶茶，坐等一场好雪的降临。



雾暝千山雪 (中国画) 郑伯萍

在国内，出门只需带上手机，钱和银行卡似乎根本不用带。即使去菜场，也是这样。尽管只是提了一只篮子卖自产蔬菜的农村老太太，也都有了收款用的二维码，否则东西卖得就不那么爽快。我曾在常熟兴福寺边上吃了葷油面之后喝茶晒太阳，有个人过来行乞要钱，我对他说：“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如果你有微信，我就打给你五块钱。”他立刻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打印的二维码，神色颇为倨傲。我当然不能食言，微信支付了他五元人民币。不过我对他说：“你有二维码也不要这样骄傲嘛，毕竟是你向我借钱！”他闻言笑了，气氛煞是和諧。

西班牙人多用现金。银行卡也用，但我发现他们更喜欢现金。我常去古玩店闲逛，每买东西，要刷卡付钱，他就会立刻说不。好几次我都因为兜里没有几个钱，只能沿街去找柜员机取钱。也许对店主来说，收现金要更划算一点吧。

老外没有网络支付的，据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信息技术落后，主要是他们比较重视隐私，觉得在线支付有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但是前几天去马德里打折村，却看到店里赫然写着可用支付宝。哈，中国游客多的地方，中国特色也就来了。就像在马德里，中国旅行团经常光顾的大商场英国宫，还有赛拉诺名品街，往往配有华人店员。想顾客所想，急顾客所急啊！如果外星人也像中国人一样钱多一样购买力强，那么奢侈品店配备外星人

内外有别

荆歌

西班牙一些华人开的店，有的也可微信支付。就我个人来说，是很愿意采取这种支付方式的，因为毕竟方便。而且，欧元的硬币种类繁多，我至今都不太分清那些毛钱和分币到底是几分几角，花的时候常常把钱包打开，哗啦啦一股脑儿倒出来，让收银员自取。西班牙人基础数学的普及看来大有问题，他们数起钱来，特别费劲，嘴里念念有词，好像不反复数数个半天就显不出他们工作认真的似的。一元二元的欧元硬币，又是特别的沉重，零钱多了放在口袋



夜光杯

里，就有古人夸耀自己有钱时所说的“老觉腰金重”。

反正马德里生活的日子，是不可能像在国内一样只带一只手机出门的。上公交车买票，如果你没有零钱，那就尴尬了，司机身上掏半天，可能最后还是摊摊手耸耸肩请你下车。

出门不光要带钱，还得要带零钱。许多自动售票机、自动售货机，只收硬币，纸币是没用的。而且你想要把纸币破开，实在不容易，因为很多地铁站里并没有任何商店。

零钱在马德里确实很有用。街头巷尾、地铁上，经常会遇到演奏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弹吉他演唱的街头艺术家，观赏他们的精彩表演，不掏个硬币出来赞赏一下就不够意思。我还经常看到有些牵狗上街的老太太，颤颤巍巍来到超市门口，就会把狗狗交给守候在门口的黑人小哥，请他暂时照看，同时摸出一枚硬币，放到小哥手上。

在中国盛行的手机支付带动下，支付宝、微信支付也逐渐进入了澳大利亚。

十日谈

付款趣事 责编：杨晓晖

说来也可笑，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前几天居然为“寻找”一包湿垃圾做起“侦探”来了。

原来，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后，对一些耄耋老人和行动不便者带来了困难。为此小区业委会和党支部提出了“自己出门带一点，钟点工离开带一点，志愿者关心带一点”的“三个一点”办法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其中，3号楼13楼的徐老师夫妻就是这样解决了家里的生活垃圾问题，他家每天产生的干垃圾等由钟点工阿姨保洁后带走，晚饭后的餐余等湿垃圾就由也是志愿者的副主任每天倒自家垃圾时到徐老师的家门口取走。经过半年多的磨合，他们每天都衔接顺畅，从没有出过什么差错。特别是徐老师只要湿垃圾放在自家门口了，他必定开着大门，让也是老人的副主任好看得清，走路安全。副主任每次取走湿垃圾了，就敲三下大门，双方互致谢意后，徐老师才会关门落锁。

不料，最近两周，副主任按照已经约定俗成的老时间去徐老师家门口取湿垃圾时，总是发现垃圾“失踪”。徐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了弄清是谁做的好事，副主任好几次提前几分钟到徐老师楼层，但仍然没有“侦查”到。就在上星期二晚上，副主任还是“扑了个空”，于是他找到一直值守在垃圾箱房前负责垃圾分类的保洁工小潘，请他提供“线索”。小潘开始也不知道，后来经副主任再三启发，这才提供给了副主任一个信息，说是最近住在副主任家隔壁的独居老人何老伯，本来他是每天晚上来投放只有少量的干湿垃圾各一袋，但最近来的时候却总是带了三袋垃圾来倾倒！

于是，副主任找到何老伯，何老伯承认是他所为。他告诉副主任：“副主任，依日里单位忙，回来为小区大家忙，我年岁大了帮不上依大忙，只能帮依带包垃圾下去。依就可以多一些辰光做其他事体了。”

从一滴水可以见大海。从一袋湿垃圾的侦破，可以看到我们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正是因为有像何老伯、副主任、徐老师、小潘这样无数位上海市民每天在各个角落以各种方式齐心协力、互帮互助、默默付出的缘故。

小区「侦探」

马蔺荣